

一个清华学子的法兰西印记

——写在父亲端木正九十五诞辰之际

○端木美

端木正(1920—2006)，我的父亲，中国著名的法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他属于受过完整的中国传统教育，同时又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的一代有代表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作为20世纪40年代末的法国政府奖学金学生留学法国，他的一生留下深深的法兰西烙印。在纪念父亲九十五诞辰之际，回顾他与法国的关系，无疑能加深对他个人学术生涯、成就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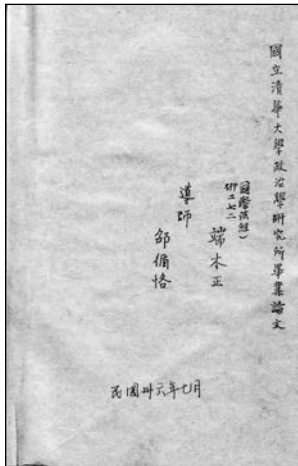
法兰西之路

父亲在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成为政治学研究所国际法组的研究生。从这时起，父亲开始第二外语法语的学习，为留学法国做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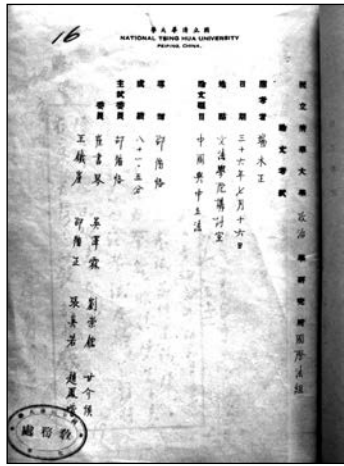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美国家

恢复中断的留学生交流工作。1946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首次举行全国留学生招生考试。父亲成为这次法国政府招收的40名留学生之一。与父亲同榜的留法同学有后来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美术家吴冠中、历史学家左景权等人。1947年父亲从清华研究院毕业，他的硕士论文《中国与中立法》(China and the Law of Neutrality)，如今完好地珍藏在清华大学图书馆。

获法学硕士学位后，父亲留在清华任助教。1948年6月23日从上海乘法国“盎特莱蓬”号邮轮(paquebot ANDRE LEBON)赴法国，于8月1日抵达马赛，旋即赴里昂，在里昂中法大学圣伊雷内堡(le Fort Saint-Irénée)进行两个月强化法语学习。里昂中法大学创办于1921年，



端木正硕士论文封面



1947年端木正论文考试文



端木正 1947年8月初摄于水木清华

在教育家蔡元培、留法前辈李石曾等人推动下，利用法国的庚子赔款余额和国内的一些捐款，在当年的里昂一座旧炮台上修建起来，资助过大批中国学生到此学习，也接待过许多临时过路的中国学生。父亲就属于这类学生。

我在里昂市立图书馆中国部的珍贵档案中发现与父亲有关的两份历史文件：1948年8月1日到里昂强化法语学习的中国学生的名单，以及1948年8月26日法国国民教育部关于中国学生去向通知信，其中父亲去巴黎。

同年10月父亲赴巴黎大学注册攻读国际法专业博士学位。此时“二战”结束，法国老一代的知名法学家尚健在，中年一代也在战争中成长成熟。父亲有幸受教于这些名师，例如：

乔治·塞勒（Georges Scelle, 1878—1961）：著名国际法专家，当时为海牙国际法科学院秘书长，高级国际研究所前任所长、巴黎大学法学院荣誉教授。父亲上过他的课：“国际法法典编撰”。

吉尔伯特·吉代尔（Gilbert Gidel, 1886—1958）：著名国际法专家，曾任巴黎科学院院长。海洋法专家。父亲上过他的课，并且带回他1946—1947年度的《海上战争的法律》等讲义。

2010年在广州家里的故纸堆里意外发现了父亲的博士论文修改本，上面有当年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马塞尔·西贝尔（Marcel Sibert, 1884—1957）：著名的国际公法专家、当时任高级国际研究所所长。是父亲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这位教授早在1931年就为一位著名的欧洲中国法专家 Jean Escarra 先生所著的《中国与国际法》作过序。

答辩委员会另外两位成员：马塞尔·普勒罗（Marcel Prelot, 1898—1972）：后来是第五共和国的参议员、担任宪法委员会成员等职务。乔治·威德尔（Georges Vedel, 1910—2002）：后来也是法国宪法委员会成员，曾担任德斯坦总统顾问。



1947年端木正学长于清华大学图书馆

□ 师友情

1950年6月15日父亲论文答辩通过，获法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国籍在国际法院组成和运用上的重要性》(Le rôle de la nationalité dans la composition et le fonctionnement de la Cour international de Justice)。论文修改草本现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论文正本仍保存于巴黎大学 Cujas 图书馆内。

获得博士学位后，父亲继续攻读了巴黎大学高级国际研究所的文凭，他的论文题目是《中国海上捕获法》(Droit des prises maritimes chinoises)。1951年12月这篇论文完稿，封面上写着“前北京国立清华大学法律系助教、法学博士端木正”。该论文原件保存在清华大学档案馆。他的教授勒华 (Le Roy) 给他的评语是：“这是一份关于中国海上捕获法严肃有用的论文。”他由此获得高级国际研究所的毕业文凭。

在法国，父亲能抓紧时间潜心研读，与法国的老师和同学也有良好的互动关系。刚到巴黎大学时，他上课记不好笔记，课后就借法国学生的笔记来看，中间他帮那些法国学生纠正一些专有名词的拼写错误。他扎实的国际法基础令法国同学大为吃惊。



2000年10月25日端木正学长（左）与留法老同学许渊冲合影

这可以看成是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教育成功的旁证。

对父亲影响较深的有两位法国著名法学教授：苏珊·巴丝蒂和夏尔·卢梭。20世纪90年代二位教授先后去世的时候，他撰文纪念这两位法国老师。

苏珊·巴丝蒂 (Suzanne Bastid, 1906—1995)：出身法学世家，其父茹尔·巴德旺 (Jules Basdevant) 战后为国际法院法官，并担任过院长。苏珊·巴丝蒂1946年被任命为教授，是巴黎大学历史上第一位女法学教授，也是当时全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父亲从1948年起，三年读过她三班课程。

“期末考试三班都是她亲自口试，不像某些老教授由助教代为口试。她认真负责的态度能激励学生奋发读书，收到言传身教的效果。”（引自《端木正文萃》第53页）她在197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20世纪80年代，父亲在阔别法国32年之后重返巴黎，幸运地与巴丝蒂教授重逢建立联系，并于1984年邀请她到中国讲学一个月，而且父亲亲自为巴丝蒂夫人在课堂当翻译，师生合作、珠联璧合传为佳话。

夏尔·卢梭 (Charles Rousseau, 1902—1993)：父亲1948年进入巴黎大学时，卢梭已是知名的中年学者，后起之秀。“卢梭教授讲课内容充实、事例丰富、学术视野广阔、言语精炼，语不惊人，既无夸夸之谈，更无哗众取宠之心。因此上课必须精神集中，否则难记笔记。”而且他的讲课中涉及中国事例最多。为此父亲特地给他写信，谈他讲课中有关中国的国际法问题，“有些是补充性的，有些是不同的意见”。教授回信并约在教授休息室面谈，“见到他时他手里拿着我的去信，信纸上已密密



1995年6月7日端木正文学长摄于巴黎大学

麻麻批注了很多。他热情的谈话令人感动，他又提出些问题相问。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对外交史的熟悉，更加敬佩的是他谦虚的、诚恳的态度和他深具启发性的谈话。”（《端木正文萃》第49页）。1993年教授去世后父亲表示哀悼和敬意：“本文只是一个中国学生向他表示感谢和致敬。”（《端木正文萃》第51页）

除了法学外，父亲从年轻时候起就对法国历史感兴趣。在武汉大学就曾专门选修过杨人榭老师教授的“法国革命史”。在巴黎他有幸上过著名的国际关系史教授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 1873—1974）的课，回国后因时代原因改教历史学，明显受其影响。晚年父亲曾盛赞这位教授：“……勒努万教授的法国对外政策史曾是国际法博士班的必修课，这位名家的讲课时号召力很大，教室中经常有须发斑白的旁听者认真严肃地听讲，尤其是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猜想这些旁听者大概是曾参战的老战士。”（《端木正文萃》第156页）

根据父亲在巴黎大学的学生登记表可了解一些他在法国留学的生活信息。最早他住在离学校稍远的太平洋(Pacific)旅馆。后来在从1949年一直住到离开巴黎的阳台(Balcons)旅馆，离巴黎大学不远。1983年父亲重返巴黎很容易就找到自己熟悉的“阳台旅馆”。1988年他应法国外交部之邀再次回巴黎讲学时，由于电报延误，法国外交部未能及时接应，父亲带着母亲从机场乘出租车来到“阳台旅馆”入住。“阳台旅馆”成了我们全家在巴黎的最重要的记忆之地。

回归祖国

1951年5月，父亲学业圆满完成，立刻启程回国。行囊里装满一切可以供他报效祖国使用的讲义、书籍。相信父亲带着印有“前北京国立清华大学法律系助教”的论文回国，是满怀期望回到清华园继续传授他从国际法学科故乡带回来的知识，为国效力。然而，随着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将成为一所工科大学。父亲接受当年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先生之邀，南下岭南大学任教。院系调整后，岭南大学消失在历史红尘中，合并到中山大学。1953年该校法学专业被取消，父亲把他的“学术初恋”国际法“只深藏在遥远的回忆之中”（《端木正文萃》第64页）。从此五十余年间这位清华学子随同那些南下的西南联大名教授，如陈寅恪等留在中山大学。历史系成为他们安身立命之所。

远离心爱的国际法专业，又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不公平待遇，很长时间父亲在历史系资料室工作而不能教书。但他的外语发挥了作用，资料室有当时发行的苏联历

□ 师友情

史杂志，由此意外地得到外部世界的学术信息，可以积累更新知识。在重返法学界之前，父亲已经在法国史领域得到全国同行的认可。他在20世纪50年代翻译的阿尔贝·索布尔(Albert Soboul)的《法国大革命》(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三联出版社, 1957年), 成为当时流行在全国高校历史系的重要参考书之一。1976年商务印书馆约请父亲和一些青年教师翻译并由他校正的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的《拿破仑时代》(上下卷, Napoleon), 1977年出版后多次再版, 成为汉译名著中最有影响的译著之一。

1978年初父亲就在《世界历史》杂志上发表批判文革史学的“评《拿破仑》”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同年5月他参加在杭州举行的关于拿破仑的研讨会。在这里，父亲有幸地见到了多位留学法国的前辈同行。如沈炼之教授(1904—1992)、戚佑烈教授(1913—1997)、王养冲教授(1907—2008)等。这些20世纪上半叶法兰西培养的学界精英们在暮年壮心不已，决心把在中国传播法国文化的使命担当起来传承下去。1978年10月在上海金山召开了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筹备会，1979年8月在哈尔滨正式成立中国法国史研究会，父亲当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同年4月份北京大学特邀父亲到北大讲课一个月，讲授法国史。他在北大作了系列关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巴贝夫等报告会，引起很大的轰动，受到热烈欢迎。

1979年10月中山大学奉教育部之命复办法律系，正是“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急需恢复法学教育、法律制度的时候。父亲正准备退休，忽然被召唤重建中山大

学法律系，被任命为首任法律系系主任。这位法国法学博士开始了新的传奇历程，一无人手、二无书籍白手起家复办法律系。他临危受命，认识到法学界急需培养新一代，开创新时代。为此，他以最大的热情不顾年迈体弱投入工作。几年之内就使重建的中山大学法律系名扬南部中国。广东高等法学专业教育在历经磨难后又重新振兴，父亲功不可没。

此后，父亲65岁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0岁高龄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93年中国恢复设在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的活动，父亲又成为新中国指派的首批四名仲裁员中的一位，连任至去世。

向法兰西致敬

在父亲饱经风霜的人生路上，法兰西始终是他人生的亮点。在法国的学业为他的学术生涯奠定坚实基础。1983年10月父亲受邀回到巴黎，与当年的老师苏珊·巴丝蒂夫人再续师生情缘，并与当年留在法国的老同学老朋友重逢。这次重返巴黎，给了父亲与法国法学家、汉学家、历史学



1988年6月端木正学长夫妇与老师巴丝蒂夫人(右)在巴黎

家们建立学术联系的机会。

此后，父亲在1986年底应邀到瑞士讲学，1988年、1995年他又两次同我母亲一起访问意大利、瑞士等国，也都重回法国。那些在法国的时光应该就是他晚年所度过的最愉快的日子。

1999年5月父亲以海牙国际仲裁员身份到海牙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100周年纪念大会。这对于他是历史性的机会。早在1949年纪念海牙国际和平会议50周年时，他是巴黎大学学生，就曾从巴黎到海牙参加纪念大会。不想命运为他安排了在100周年重返海牙的机会。这个世界上也许很少有人能像父亲那样在百年间参加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两次重要纪念庆典。这次他直接从北京到荷兰，没能顺访法国。回国后，由于健康原因，他没能再重返法兰西。

即使在国内，父亲也与那些同时代留学法国归来效力的老同学在欧美同学会保持联系，他们在耄耋之年依然保持年轻时代在法兰西的精神、理想和热情。他们在欧美同学会留下的欢声笑语成为了世纪绝唱。2006年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应时任法国驻广州总领事卜来世（Daniel Blaize）夫妇之邀，父母亲在广州出席国庆招待会。这是父亲向法兰西的最后致敬。

结语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命运跌宕起伏，但他是中法文化培养出来的最优秀的人物之一。从清华园到法兰西，父亲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他人生品格、学业、志向的铸炼。他在60岁之前历尽磨难，花甲之年才重见天日。他是一个能站在中西方文化交汇制高点上纵览全局的智者，是一个

能在跨学科的领域中引领潮流的学者，因此才能在法学、历史学的教学、科研中，在各种社会活动、对外交往中全面施展他的才华、智慧、魅力，在国内外都赢得很高声誉。在他去世后，来自国内外的唁电唁函高度评价父亲高风亮节的一生。他那些悲伤而又忠实的弟子们在他去世后第二年集资为他铸造一座青铜半身雕像，矗立在中大的制高点图书馆旁，栩栩如生，永远微笑地面对未来。

如今，那些永远怀念他的弟子们又在他九十五岁诞辰之年发起成立“端木正法学基金”，表达对老师花甲之年复办法律系的艰辛的感念，永记老师对南部中国法学教育的贡献；缅怀他一生“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人文情怀、继承他“广得英才而育之”的理想，为国家培养更具国际视野、更具学术情怀、更有人格力量的国际型法律人才。该项基金在2015年5月4日青年节成立，必将惠及更多青年学人。法国新任驻广州总领事傅伟杰（Bertrand Furno）出席了这个简约感人的仪式，为活动又一次留下法国印记。

2015年5月

端木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参考书：

《端木正文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11月。

《明德集》，黄瑶、赵晓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鸿迹》，主编王振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